流動性認知對重分配政策偏好之影響

董祥開*、郭建佑**

摘要

Benabou與Ok提出「向上流動預期(POUM)」理論架構以分析民眾流動性預期以及重分配政策偏好之間的關係，渠等指出人們即便目前的社經地位低於社會平均，但如果預期將來自己會向上流動到高於社會平均，則這股向上流動的預期會削弱他們對重分配政策的偏好；同樣的，人們在成長過程的經歷會影響到他們成年後的重分配政策偏好；也因此人們目前的重分配政策偏好，會受到他們過去的流動性經歷以及未來的流動性預期所形塑。本研究利用TEDS2013年面訪資料庫分析臺灣民眾的重分配政策偏好，經實證分析得到下列三項發現：第一，具有正向流動性認知者較反對政府採取重分配的政策。第二，個體層級的流動性預期較總體層級的流動性預期更具影響力。第三，與流動性經歷相比，流動性預期的影響力較具有邏輯與一致性。本研究之發現除讓POUM理論在我國環境系絡下得到驗證外，亦有助於政府採取有效方式推動重分配政策。

關鍵詞：POUM理論、流動性預期、流動性經歷、重分配政策、社會流動

*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助理教授，E-mail:hkdong@nccu.edu.tw。
**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碩士。

壹、緒論

重分配政策一直以來都是一個熱門的話題，早在啟蒙時期法國思想家Voltaire就曾經說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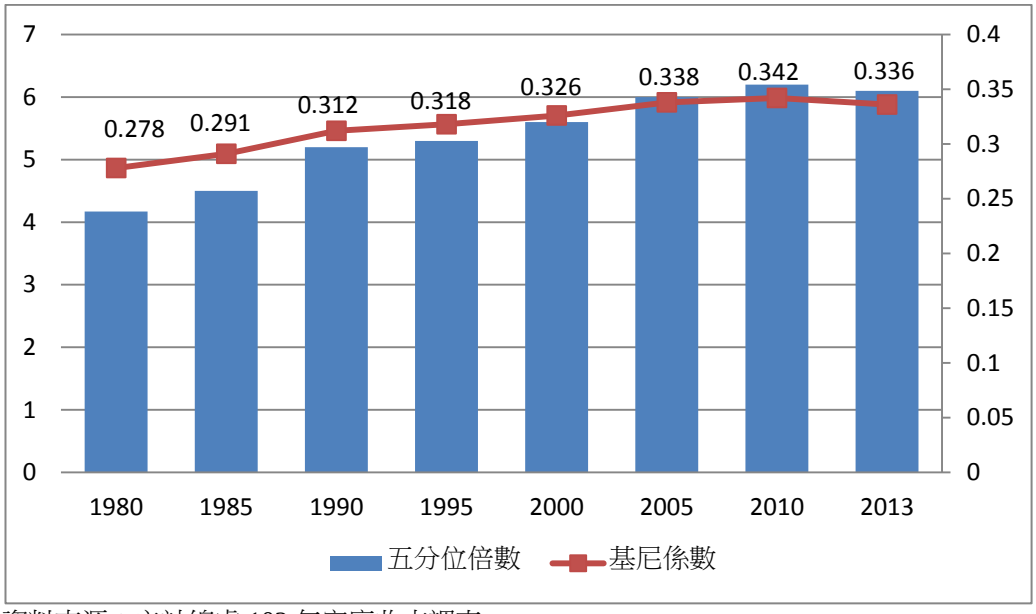
一般來說，政府施政的藝術在於盡可能的從某階層的公民拿錢來分給另一階層的公民[1]。

當時的歐洲重商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盛行，國家內貧富差距的問題開始成為主權國家所要面對的重要議題；Voltaire觀察到當時的法國種種社會現象，即主張政府的職責應該包括資源的重新分配，更具體的說，就是現代政策科學家所稱的「重分配型政策」。

臺灣自從1950年代國民政府遷台後實施的一連串經濟改革，從簡單的進口替代、出口擴張，1970年代開始的十大建設再到1980年開始的科學工業園區等等一連串由威權政府所主導的經濟政策，創造了所謂「臺灣經濟奇蹟」。然而，即便執政的政府宣稱臺灣所得分配惡化的情形並不嚴重，但經濟成長的背後卻隨著時間而引發越來越龐大的分配正義問題，可以從兩個面向觀察：

(一) 從客觀數據面觀察：目前國際上衡量一個國家貧富差距情形常用的兩個指標是五分位倍數與基尼係數 (Gini coefficient)。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102 年家庭收支調查報告」的資料，如圖 1 所示，我國收入最高的百分之二十的所得與最低百分之二十所得之差距倍數從 1980 年的 4.17 倍增加到 2013 年的 6.08 倍，而基尼係數同樣從 0.278 增加到 0.336。五分位倍數與基尼係數的增加均顯示我國的貧富差距與所得分配不均的情形隨時間而惡化。

[1] 原文：En général, l’art du gouvernement consiste à prendre le plus d’argent qu’on peut à une grande partie des citoyens, pour le donner à une autre partie 參照 http://en.wikiquote.org/wiki/Voltair



資料來源：主計總處 102 年家庭收支調查，
取自：http://win.dgbas.gov.tw/fies/a11.asp?year=102。

圖 1　臺灣所得分配差距變化圖

(二) 從主觀的感受來觀察：根據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於 2014 年所進行的總統滿意度電訪案第八次調查資料顯示，1076 位受訪者中有對「有人說，在我們的社會上有錢的人越來越有錢，窮的人越來越窮，請問您同不同意這種說法？」這個問題回答非常同意與同意的比例高達 86.7%。不論是客觀的經濟數據和分配指標，亦或民眾的主觀感受都顯示在臺灣貧富差距的問題確實是政府必須重視的議題，而重分配政策即是縮減貧富差距以及調節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之一。

那麼，哪些人會對重分配政策產生偏好呢？從單純的經濟理性的論點，就一般直覺來說，當人民的收入所得較低，或是認為貧富差距問題十分嚴重的時候，人民就會對重分配政策產生較高偏好，然而民眾對重分配政策的偏好真的是如此單純嗎？Alesina(2005)針對美國與歐洲進行跨國分析，發現美國雖然收入差距較歐洲明顯，但實施重分配政策的頻率與強度卻不及歐洲國家，同時Anderson與Shimul(2016)亦發現產業發展中的國家即便貧富差距較大，但民眾普遍不支持重分配政策；若民眾的重分配政策偏好確實僅受主觀經濟理性所驅使，為何美國這樣的民主國家並未依照民意而實施大規模的重分配政策？上述例子指出，單純從

客觀的經濟不平等數據的資料來分析民眾對重分配政策的偏好是不盡周延的。

Rawls(1971)以「無知之幕」表示人們在「原始狀態」下，人們由於對「將來」的不確定性感到懼怕，因為害怕自己將來會成為社會中較低層的族群，是以會希望給予社會底層的人多一些的社會保障，而達成社會正義的目標，也闡述了道德的宗旨；然而，借用Rawls的觀點來分析個體對未來預期與重分配政策偏好的關係，這樣的哲學其實反映出了人們面對未知的恐懼會表現出「風險規避」的行為，因此會對具有社會保險色彩的重分配政策產生偏好。

Benabou與Ok在2001年研究中提出了「向上流動預期(Prospects of Upward Mobility, POUM)」理論架構，他們指出，即便常理上窮人會因為重分配政策獲利，而較富人更支持重分配政策，但一但考量到對未來的「預期」，即若窮人認為在未來自己有機會在社會上往更上層流動的話，反而會反對重分配政策的推行，以避免到時候「害到」自己或是自己的子女。同樣地，Alesina與Giuliano (2009)發現，過去曾有過「不好的經歷」的人，會使他們在心理上更加懼怕風險以及再次遭受災難，因此會更大程度的支持重分配政策來保障自己的利益。上述兩個研究將時間的縱向概念加入民眾對重分配政策的偏好研究，也表示了當我們以經濟理性觀點在探究民眾的重分配政策偏好時，除了民眾目前的經濟情況之外，更應該考慮他們「過去的經驗」以及對主觀的「未來的預期」。

因此，本研究除欲探討POUM理論的假設在台灣的適用性之外，更希望了解臺灣民眾的流動性認知是否會對重分配政策的態度產生影響？綜上所述，本研究期具體的研究問題如下：第一、民眾對未來主觀的流動性預期是否會影響對重分配政策的偏好？如何影響？第二、民眾對過去主觀的流動性經歷是否會影響對重分配政策的偏好？如何影響？

貳、文獻回顧

一、重分配政策

Alesina(2009)指出當代的福利國家有兩個主要目標，一是將財富由富人階級重新分配給窮人階級，另一個是提供社會保險；這個觀點即點出了重分配政策在當代民主國家的重要性，此外從理論的角度出發，重分配政策的重要性以及普及性更是豐富：1. Lowi(1964)甚至認為所有的政策類型就「長期」(long term)來看由

於均涉及到利益與權力的重新洗牌效果，是以都具有重分配的效果 (redistributive effect)（轉引自羅清俊，1988：576）；2. Easton(1959)指出公共政策基本上就是權威性的社會價值分配；上述已可看出由於涉及到「分配」與「權利義務」等核心議題，重分配政策之重要性自然是現代國家所重視的。

(一) 重分配政策之定義

「誰從政策中獲利？」是我們分析政策科學時的一個核心問題（Lasswell, 1936；轉引自羅清俊，1988：575），而Lowi(1964)則根據這個標準將重分配政策視為「利益」以及「負擔」均集中在標的團體的政策類型。更具體的來說，重分配政策乃是指政府基於某些原因，對社會上的某些標的團體的利益或義務，轉移到社會上另一標的團體受利或承擔的政策；如累進稅率是對富有階級的財產透過累進的方式進行課徵，然後再將這些稅收，透過各種「現金移轉(in-cash transfer)」或是「實物移轉(in-kind transfer)」的方式轉移到社會上較貧窮的群體，以縮小貧富差距。更細緻地說，重分配政策之類型相當廣泛，Meier (2007:92-94)具體的說明了重分配政策主要包含的政策領域，分別為所得穩定、社會福利、健康照護、居住需求以及所得分配；之中較所得分配(income distribution)政府係針對社會上之財富進行直接介入，例如累進稅率的課徵等等，為最狹義之重分配政策。

(二) 市場失靈與重分配政策

從市場失靈的角度出發，福利經濟學派認為政府的主要功能是提升「效率」，而收入不均與貧富差距擴張是市場失靈的主因，是以即便重分配政策之爭議性非常高，政府仍有十分穩固的理論基礎去執行。以下就市場失靈與重分配政策之間之關聯性分析：

1. 從公共財(public goods)角度看重分配政策

Andreoni(1990)指出純粹的「利他主義」無法完全解釋為什麼高所得的民眾會樂於捐款給慈善團體─有時社會上的富有階級其實是基於「自利」的心理才會透過捐贈或參與慈善的方式來達到重分配的效果，原因包含下列兩者：首先，由於富人希望社會上的貧富差距情形不要太過嚴重─因為太高程度的貧富差距會使社會氛圍對富有階級產生敵意與不友善；再來，富有階級會希望透過捐贈的方式增加自身的名望並贏得聲譽，並贏得社會上的尊敬；在這兩個前提下，整個富有

階級的效用會受到貧窮階級的所得所影響，而富人為了增自身的效用（也就是贏得名聲），會透過捐贈或是慈善的方式將自身的所得移轉至貧窮階級，以增加貧窮階級的所得─更重要的是，增加自身的效用。

此外，徐偉初（2012）指出因為社會上大多數人均不會認為所得差距擴張是一件好事，是以大家會希望社會上的所得分配不要太嚴重，是以重分配政策就是一個矯正所得分配的政策工具，然而所得重分配一方面使社會上所有人共享所得重分配後的好處（貧富差距較小的社會），另一方面我們也無法排除社會上不繳稅或沒有承擔執行所得重分配費用的人於重分配效果之外，是以所得重分配是一個典型具有「非敵對性」以及「非排他性」的公共財，從Weimer與Vining(1992)的觀點來看，公共財是造成市場失靈的因素之一，是以政府必須介入，施行重分配政策，以矯正市場失靈。

2. 從資訊不對稱(information asymmetry)看重分配政策

重分配政策具有「社會保險」的特質(Alesina, 2009; Meier, 2007)，可以「平滑」人們將來因風險不確定性所產生之損失(Rehm, 2005)，因此民眾基於對未來保障的渴望會對重分配政策產生偏好；一般保險市場同樣有各式各樣的保險商品可以提供一樣的保障功能，然而如上一節所述，由於資訊不對稱的緣故，私人的保險公司會產生逆選擇的缺失，導致願意納保者其實對保險公司來說都是負擔，而真正對保險公司有利者在衡量自身發生意外機率後則不會選擇進入保險體系，這樣劣幣趨逐良幣的影響下導致單純由私人公司所提供之保險會導致市場失靈的結果，但社會保險是現代國家的重要核心功能(Alesina, 2009)，政府不能夠就放任其受市場機制所運作。是以，若從社會保險的角度來看重分配政策，政府藉由立法強制力將所有人納入保險體系中，即是矯正資訊不對稱的方式。

二、流動性認知與重分配政策偏好

傳統上經濟學者認為個體對某些事物的偏好程度取決他們對這個事物所造得到的效益有關，人們期望能夠將成本極小並極大化自身的利益，而同樣的邏輯也可以應用在理解人們對重分配政策的偏好上(Alesina & Giuliano, 2009)；從「經濟人」的角度出發，重分配政策將有錢階級的利益重分配給窮人階級，有錢階級是政策犧牲者，窮人階級則是政策受益者，是以就邏輯來看，窮人階級會較富人階

級支持重分配政策，而實證研究也支持了這樣的推論(Alesina & La Ferrara, 2005; Isaksson & Lindskong, 2009; Rainer & Siedler 2008)，然而當我們考量到收入隨時間而變化以及社會的流動性時，我們就必須要考量到個人對未來的向上流動與向下流動的預期，以及個人過去向上或向下的流動性經歷。

Benabou與Ok在2001年正式提出POUM理論架構，將個體對未來的預期帶入重分配政策偏好的研究中。而在實證的研究中，流動性預期對重分配政策的影響十分明顯，不論是微觀的個體層級還是宏觀的總體層級的研究都證實了流動性預期與重分配政策之間的關係

(一) POUM 理論：概念與定義

Piketty(1995)最早提出關於社會流動性以及重分配政策偏好的假說，他指出人們無法精確的知道自己未來在社會上向上流動的機會，一旦預期到這個機會渺茫，則會開始對重分配政策偏好產生影響。Piketty(1995)的假說開始使政策學者注意到流動性的重要，但要到2001年學者Benabou與Ok才正式將POUM理論予以系統化。該理論指出，人們關心的不只是目前的收入水準，而同樣關切他們未來的預期收入。是以如果目前的重分配政策是持續性的，則人們在選擇支持或反對重分配政策時，會將自己的未來收入也放入考量。因此即便個體「現在」是屬於窮人階級，若是預期自己在「未來」的收入水平會變高成為富有階級，那麼若是現在支持重分配政策，到時自己反而會因為必須付出高額的稅率而變成重分配政策的受害者，因此為了使個體的利益極大化，他們會反對政府的重分配政策；同樣的，即便個體「現在」是富人階級，若預期自己「未來」的收入水平會較現在不佳而成為窮人階級，那麼他們會支持政府的重分配政策(Benabou & Ok, 2001: 448)，以保障未來的自己；在他們的模型中指出POUM假說裡包含了三個「假定」：1. 現在的重分配政策在未來改變的程度很低，也就是人們對現在的政策所做的決定，在未來還是會俱有某種程度的持續性；2. 個體不能是太過風險趨避(too risk averse)，他們必須知道重分配政策能保障他們因向下流動所產生的損失；3. 也是最關鍵的假定(the key premise)─自己（或他的家庭）收入目前比整個

社會的平均收入─舉例來說，中位選民 (the median voter)[2]─低，並預期自己（或他的家庭）將來的收入會高於社會的平均水準，這種「跨層級」的預期心理會使他們反對政府的重分配政策。他們最後利用經濟模型分析出在重分配政策不變的情形下，如果個體預期未來自己在社會上的位置會比現在好，則目前收入低於平均值的窮人會因為考量到「未來」的效益而反對「現在」的重分配政策。

POUM理論的出現使得學者在分析個體對重分配政策時，將視野擴大至個體對未來的預期以及風險的評估。然而由於受限於二手資料的不完整性，關於檢視POUM理論的研究卻相對缺乏(Cojocaru, 2014)，Checchi與Filippin (2004:16)認為利用二手資料檢視POUM理論是不容易的，模型需要包含以下四個要素，才能將個人對流動性預期對重分配政策偏好之關係從其他因素中區分出來：

1. 目前的社經地位水準(the current income position of the respondent)
2. 預期未來的社經地位水準(expectations of future income position)
3. 個體的風險趨避程度(the degree of risk aversion)
4. 預期重分配政策的穩定性(expectations regarding the persistence of policy)[3]

然而由於受限於二手資料，即便既有的文獻中有探討流動性預期與重分配政策偏好的研究，但沒有任何的研究符合Checchi與Filippin (2004)所提出的標準，(Cojocaru, 2014)。是以在實證研究中，學者操作POUM理論的方式受制於資料的限制而有不所同，以下分別介紹幾個較有代表性的研究。

(二) POUM 理論：實證分析

Ravallion與 Lokshin (2000)最早以「隧道效應」(tunnel effect)表示個人對未來預期的重要性：兩個線道的車輛同時往一個方向行駛，但都因為塞車的關係而停住。假設其中一個線道的車子開始移動，則仍然卡在車陣中另一線道的駕駛看到隔壁開始動了，就會預期將來自己也快要可以開始移動，心情也就會較為舒緩。

---

2 根據公共選擇理論，所得為中位數的選民的支持是會是影響選舉結果的關鍵因素。如果中位數選民的所得低於總體平均值，則中位數選民就會投票給支持建立較高稅率政策的政治人物以期重分配政策能夠增加自身的利益；相反地，如果中位數選民的所得高於總體平均值時，他們則會投票給較不支持重分配政策的候選人，以免自己成為政策的受害者（陳文學、羅清俊，2012）。

3 所謂預期重分配政策之穩定性，乃為了確保於模型中自變數（流動性認知）對依變數（重分配政策偏好）不會受到諸如政黨輪替等政治事件影響而干擾影響力，因而須投入之控制變數。

這個比喻指出了即便個人「現在」的狀況不佳，那麼只要對未來抱持著樂觀的預期，都會使人們感到愉悅而不至於產生負面的情緒，是以人們對未來流動性的樂觀程度不同，是影響民眾對重分配政策偏好程度的重要考量因素。他們利用俄羅斯追蹤關注調查(Russian Longitudinal Monitoring Survey, RLMS)分析「隧道效應」是否存在俄國民眾與對重分配政策偏好之間的關係；他們將1996年RLMS的樣本區分成三個次群體，分別代表「預期未來變好」、「沒有改變」以及「預期未來變差」的民眾對重分配政策偏好；接著細分來看，那些預期未來兩年會過得比較差的民眾對重分配政策有非常高的偏好，而目前的收入階級幾乎不會對重分配政策造偏好成差異；反之若對未來持樂觀態度者則反對重分配政策，且富人的反對程度高過於窮人，但不論是現在是富人還是窮人，只要對未來是樂觀的，都比未來悲觀者更反對重分配政策。

Alesina與Ferrara(2005)利用美國GSS (General Social Survey)以及PSID (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兩個大型資料庫進行分析比較，他們發現，就常理來看，收入越不均等、貧富差距越嚴重的國家，民意應該會驅使政府提供更多的重分配政策來矯正這種現象，然而即便美國的貧富差距明顯高於歐洲，但美國政府的重分配政策的頻率與稅率卻較歐洲小；渠等認為這種現象可以由流動性的觀點來解釋─也就是說美國人由於文化的形塑使得人們普遍對未來有較好的預期，樂觀的認為美國將來的前景會較目前來的好，此外較高的社會流動性代表著人們較相信未來自己可以有機會藉由努力來達到社會經濟地位的上層，這種認為「努力」大於「運氣」的文化氛圍導致美國的低稅率以及低頻率的重分配政策；反之歐洲的流動性預期趨於平穩，也缺乏美國人的這種文化氣息，是以美國的重分配政策程度較會較歐洲來的小；他們認為不同國家的流動性預期是可以解釋不同國家重分配政策的重要因素，渠等的研究也將POUM理論的觀點擴大至宏觀的國家層級。

Rainer與Siedler(2008)利用德國社會經濟資料庫(German Socio-Economic Panel, SOEP)分析POUM理論在是否可以用來解釋東西德民眾對重分配政策的偏好；首先他們創立「對未來樂觀變數」以及「對未來悲觀變數」分別代表向上與向下的流動性預期，用機率表示未來兩年內個人預期自已「升官加薪」以及被「降職減薪」的機率，並以此分析民眾對政府課予財團管理階級稅率的評價；他們發現到

德國民眾對未來樂觀程度較高者認為政府課予的稅率太高了，而對未來持悲觀態度者則認為稅率太低─且影響程度上幾乎是樂觀者的兩倍；是以他們認為，「向下流動預期(downward mobility)」反而比「向上流動預期(upward mobility)」更能對重分配政策偏好產生影響。

Alesina與Giuliano(2009)亦以GSS資料庫分析1972年到2004年間POUM理論影響美國民眾對重分配政策的偏好，他們以「自己與父親教育年限差異」和「自己職業聲望是否高於父親」兩個變項視為流動性預期，並控制住父親的教育程度以及在16歲時的家庭經濟收入；結果顯示在控制變項方面，擁有較高教育程度的父親以及較高家庭經濟收入者會減少對重分配政策的偏好，而「自己職業聲望高於父親」者也同樣對重分配政策產偏好程度生負面影響，這樣的結果與之前的研究發現是一致的(Alesian & Ferrara, 2005)。

Cojocaru(2014)是目前所有關於檢視POUM理論中最符合Checchi與Filippin (2004)所設定之標準的學者。他利用由世界銀行與歐盟合作之第二輪生活轉型調查 (Life in Transition Survey, LiTS2)的資料庫來分析公民對重分配政策的偏好。該研究首先利用資料庫創立了一個「社會階層階梯」，由最底層到最上層總共十層，分別代表最貧窮的10%至最富有的10%，接著詢問受訪者覺得自己「現在」以及「預期未來四年」所在的社經地位，接著以風險趨避程度高低區分成「高風險趨避」以及「低風險趨避」兩組進行分析；他發現POUM理論確實可以解釋歐洲公民對重分配政策的偏好程度，「在低風險趨避的前提下」，那些預期將來會過得好的人比那些預期將來過的比較差的人還要不支持政府應該減少有錢階級與貧窮階級之間的差異，但若個體太懼怕承擔風險─也就是風險趨避程度太高，則流動性預期對重分配政策偏好的影響就不俱有那麼大的效果。

(三) 流動性經歷與重分配政策

Checchi與Filippin(2003)認為影響重分配政策偏好的因素很多，個體的流動性經歷 (history of mobility at individual level)─或Piketty(1995)稱之個人歷史因素 (individual history)─同樣屬於流動性的概念即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Piketty(1995)指出人們過去的個人經歷 (individual experience)是一種自我學習的機制，在人們成長階段發生的經歷會對他們成人後的觀念造成影響，會藉由調整個體對「公平的認知」途徑進而影響個體對重分配政策的偏好。具體的說，民眾過去的經歷會

藉由不同的動機去影響到現在對重分配政策的偏好，個體在過去有過不好的經驗，會使他們變得更加的風險趨避，並降低對未來的樂觀程度，更直接的是，民眾在經歷過各類型的災難後會使他們更加注意到政府干預的重要性(Alesina & Giuliano, 2009)，而也因此更加重了對重分配政策的偏好；反之，若過去幾年有較好的向上流動經歷，會使他們預期將來也會同樣有好的發展，因此會反對重分配政策 (Revallion & Lokshin, 2000)。

在Alesina與Giuliano(2009)的研究中，他們首先控制住其它可能影響重分配政策偏好的個人變項後，在模型中分別加入幾個負面經驗的變項：這十年內的失業經驗以及過去五年內兩個人生經驗中悲傷的經歷：包括親人去世、離婚或住院等，來分析流動性經歷對重分配政策偏好的影響，而結果也如預期般，所有的這些負面經驗都對重分配政策偏好造成了正面的影響。

(四) 小節

從上述的相關文獻中可以看出，個體對重分配政策偏好的程度除了會受到個人現在的經濟與主觀社會地位影響外，更會受到個體過去的流動性經歷以及對未來的流動性預期所影響，個體若對未來有較好的預期，則根據POUM理論，即便現在的社經地位較低，但若預期將來自己會有「向上流動(upward)」的可能，則根據理性自利的觀點，為了避免將來自己或自己的下一代成為重分配政策的受害者，會反對重分配政策(Benabou & Ok, 2001)。反之若現階段預期將來會過得比較差，有著「向下流動(downward)」的預期，一方面基於理性自利觀點希望將來的生活能受到政府保障，一方面強化了個體基於風險規避的心理，會支持政府的重分配政策以保障自己將來的不確定遭遇(Rehm, 2005)。同樣的，若人們過去有過不好的流動性歷史，則會使個人變得更加害怕風險，同時認為未來可能也不會變的比較好，因此也會偏好政府提供更多的重分配政策，以期能發揮社會保險的功能來分散風險。

參、研究設計

一、資料來源

本研究採用二手資料分析，資料庫來源為「臺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簡稱TEDS)資料庫，該計畫係由政

治大學政治系黃紀教授主持，科技部人文司、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及政治學門共同支持的大型民意調查計畫。

綜觀TEDS眾多的歷年計劃中，基於樣本數以及問卷適合性等因素，本研究決定採用TEDS於2013年所進行之大規模基點面訪調查所蒐集的資料。該面訪案以縣市為單位，依照人口數進行隨機抽樣，自民國102年6月下旬至8月中旬，在全臺灣共計訪問完成2292個二十歲以上有投票權之公民。該問卷乃是一份綜合性的民主化與政治態度之問卷，內容詳細的包含了受訪者對公共事務與一般性社會議題的看法，在個人基本背景的調查方面也十分周延，此外為了使訪問成功之樣本符合母體結構，該資料事後以母體的「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與「地理區」進行多變數反覆加權法(raking)，經過樣本檢定與加權後與母體結構並無差異。

二、研究假設與研究架構圖

本研究主要是探討個體流動性認知，也就是對未來的流動性預期以及對過去的流動性經歷如何影響民眾對政府重分配政策態度的偏好；文獻回顧中，Benbou與Ok指出民眾若有較好之流動性預期，基於經濟理性之觀點會減少對政府之重分配政策偏好，同時，這個偏好同時受個體與總體級所影響(Alesina & Ferrara, 2005)，因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設一與研究假設二如下：

H_1：與那些預期未來**臺灣**經濟會變不好的人相比，認為**臺灣**未來一年經濟情形會比現在更好的人，會較反對政府介入貧富差距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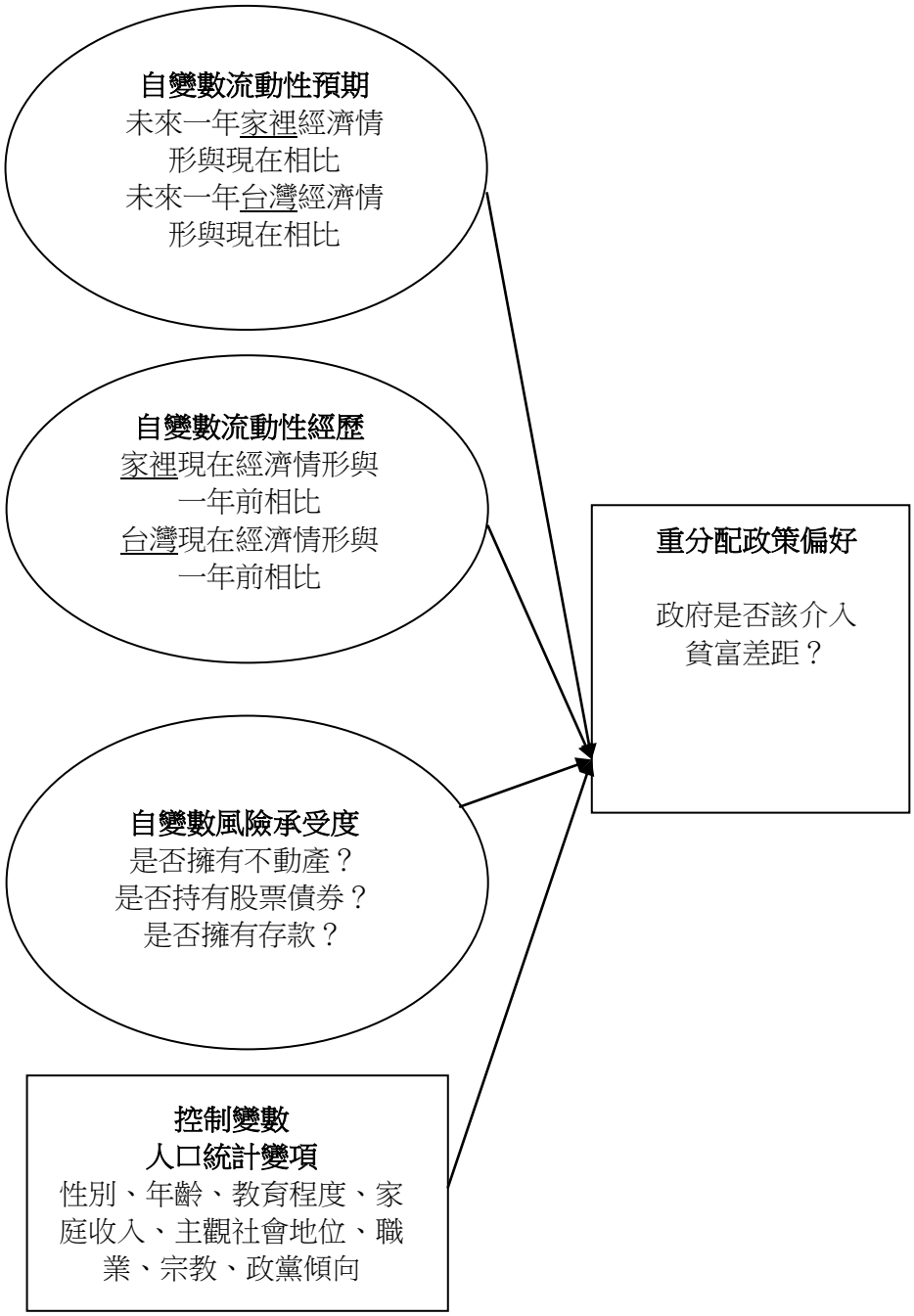
H_2：與那些預期未來**家裡**經濟會變不好的人相比，認為**家裡**未來一年經濟情形會比現在更好的人，會較反對政府介入貧富差距的問題。

除了流動性預期，因為過去的流動性經歷也會對人們的重分配政策偏好產生影響(Piketty, 1995)，較好的流動性經歷者會較反對政府的重分配政策(Alesina, 2009)，故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設三與研究假設四如下：

H_3：與那些認為臺灣現在經濟比過去還差的人相比，認為臺灣現在經濟比過去一年還好者，較會反對政府介入貧富差距。

H_4：與那些認為家裡現在經濟比過去還差的人相比，認為家裡現在經濟比過去一年還好者，較會反對政府介入貧富差距。

除上述自變數，本研究同時分析風險偏好以及其他傳統人口統計變項政府對重分配政策偏好所產生之影響，相關研究架構如圖2。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

圖 2　研究架構圖

三、變項操作化

(一) 依變數：重分配政策之偏好

在相關文獻中，測量民眾重分配政策偏好時依變數選擇方式有兩種，一種是直接詢問民眾對「具體」重分配型政策的偏好與評價，例如林翠芳與何志祥（2011）利用社會變遷調查中民眾對於醫療保健、老人年金失業保險的態度；另外一種方式是以民眾是否認為政府應該縮小貧富差距或照顧弱勢族群等較「抽象」的概念作為衡量指標，例如Alesina(2009)使用的指標為「是民眾還是政府應該為自己負責？」；實務上，由於二手資料的限制，只有少數政策偏好或政治相關之資料庫會有適合第一種題目的可能性，一般的文獻均是以第二種方式為主，也就是以類似抽象概念的政策價值指標來推估民眾的政策方案偏好。

本研究因此主要係探討關於民眾對「減少貧富差距」作為重分配政策偏好的指標，這樣的方式也符合過去文獻中的操作方式(Alesina & Giuliano, 2009; Cojocaru, 2014; Ravallion & Lokshin, 2000；陳文學、羅清俊，2012)，該問卷中詢問民眾有關重分配政策偏好的題目為第F8題：有人說：「減少貧富差距是政府的責任」，也有人說：「有錢沒錢是自己努力的結果」，請問您比較同意哪一種說法？」，本研究將回答「自己努力結果」者視為對重分配政策較不支持，編碼為0，回答「是政府責任」者視為對重分配政策有較多的偏好，編碼為1，建立一個二元的變項。

(二) 自變數

1. 流動性預期

由受訪者對家裡未來一年經濟情形的預期以及對臺灣未來一年經濟情形的預期等兩題所組成，分別為「請問您覺得臺灣在未來的一年經濟狀況會變好、還是變不好，或是差不多？」與「請問您覺得您家裡現在的經濟狀況與一年前相比，是比較好、還是比較不好，或是差不多？」；分別以回答「家裡未來會變比較不好」以及「臺灣未來會變不好」為參照組，建立「預期家裡將來會變好」、「預期將來家裡差不多」以及「預期臺灣將來會變好」與「預期將來臺灣差不多」等四個虛擬變數。

2. 流動性經歷

由受訪者對家裡過去一年經濟情形的評價以及對整個臺灣過去一年經濟情形

的評價等兩題所組成，分別為「請問您覺得臺灣現在的經濟狀況與一年前相比，是比較好、還是比較不好，或是差不多？」與「請問您覺得您家裡現在的經濟狀況與一年前相比，是比較好、還是比較不好，或是差不多？」；分別以回答「家裡現在變比較不好」以及「臺灣現在變比較不好」當參照組，建立「評價家裡現在比較好」、「評價家裡現在差不多」以及「評價臺灣現在比較好」、「評價臺灣現在差不多」四個虛擬變數。

3. 風險變數

Checchi與Filippin認為檢驗POUM理論時個體地風險趨避程度是一個必須被控制的變數，然而TEDS2013年的問卷中並沒有直接詢問受訪者對風險趨避的題目，因此本研究採用問卷中「請問您或您的家庭有沒有擁有自己的房子或公寓？」、「請問您或您的家庭有沒有存款？」以及「請問您或您的家庭有沒有擁有股票或債券？」等三個題目當成「風險承受度(risk tolerance)」的衡量，作為對風險趨避的代理變數(proxy variable)[4]，同時合併擁有房子或公寓與擁有存款兩題組為「資產」變數，本研究預期當民眾持有更多資產時，由於可承受之風險程度較高，因此會較反對重分配政策，而擁有股票者則相反。

4. 人口統計變項

我們仍將控制傳統之人口統計變項：性別、宗教、職業、教育程度與政黨傾向設定為虛擬變數：男性編碼為0，女性編碼為1；無宗教信仰者編碼為0，有宗教信仰的編碼為1；職業以高階白領為參照組，建立中低白領、藍領以及農林漁牧三個虛擬變數；政黨認同以泛綠認同為參照組，建立泛綠藍同與中立選民兩個虛擬變數。年齡、教育程度、家庭收入與主觀社會地位則均為連續變數，數字越大代表該題值越高。

[4] 由於研究重分配政策偏好的文獻幾乎都是使用次級資料分析，是以當研究者在檢驗流動性預期與經歷對政策偏好的影響時，往往須屈就於現有的數據，因此「代理變數」就是研究者時常會使用的方法，比如說Alesina 與 La Ferra (2005)以GSS資料庫進行分析時，即使用「過去五年內是否有失業的經驗」這個問題來做為流動性經歷的代理；而關於風險變數的使用上過去如Cojocaru (2014)以 LiTS2中「假若你是農夫，是否願意販賣汽車換取現金以購買防止天災摧毀即將採收之穀物」作為衡量因子得直接測量民眾的風險承受度最為理想；本研究以家庭是否持有相關避險資產作為代理變數，即便可能會因為分析單元係個人而非家庭而導致代理效果雖不如前述案例，但仍有一定程度之代理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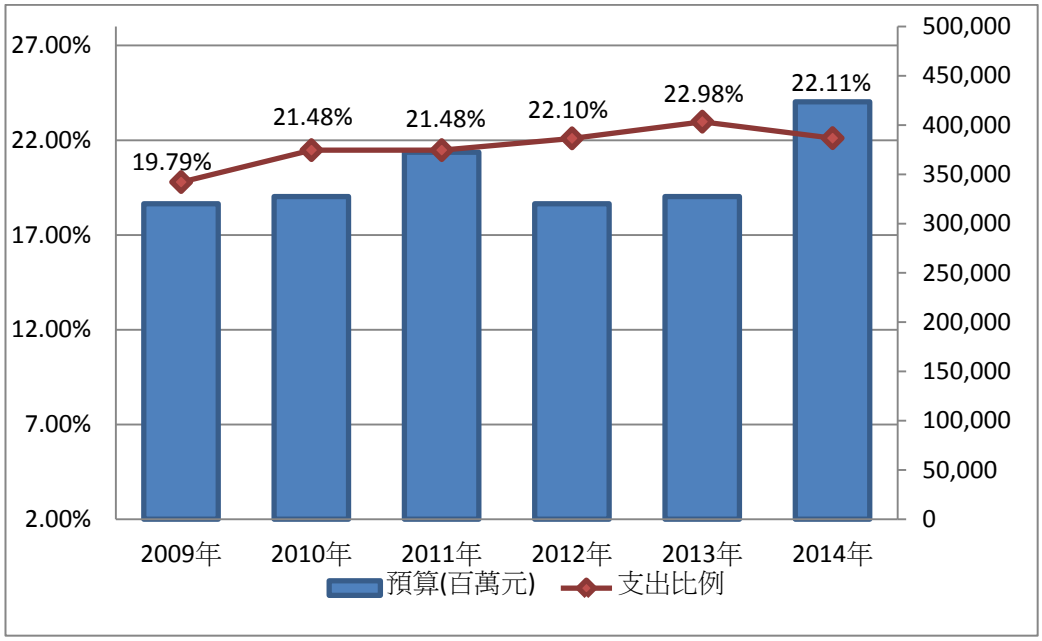
在文獻回顧中提到，Checchi與Filippin(2004: 16)認為以二手資料驗證POUM理論並不容易，至少需要包含下列四個元素：(1)個體對未來的流動性預期：以評估對未來的樂觀程度；(2)個體的風險趨避程度：個體的風險趨避程度必須被控制；(3)個體目前的經濟與主觀社會地位：以評估目前的階級；(4)個體對重分配政策穩定性的預期；本研究主要即是以二手資料分析人民的流動性認知是否會影響對重分配政策的偏好，以下分別論述之：

(1) 對未來流動性預期：取自問卷中個體預期自己家裡與臺灣未來一年經濟情形的兩個題目。

(2) 個體的風險趨避程度：如前段所述，TEDS2013 並沒有直接詢問受訪者風險偏好的題目，因此本研究採用是否擁有公寓、存款以及股票債卷等三題作為風險承受度的代理變數。

(3) 目前的經濟與主觀社會地位：使用問卷中家庭收入與主觀社會地位兩個題目。

(4) 對重分配政策穩定性預期：TEDS2013 同樣沒有詢問受訪者是否預期政府重分配政策是否是會維持穩定的題目，但由於過去幾年中央政府並沒有發生政黨輪替，同樣的執政黨在議題上的態度或許會微調，但大幅改變的機率不高，此外我們也可以從行政院主計總處釋出的資料發現到，如圖 3 所示，過去幾年內相關社會福利預算都約佔中央政府總歲出的五分之一上下，且在未來除非有重大社會經濟危機發生否則均不太可能大幅變更，因此本研究假定受訪者認為過去重分配政策的實施情況是穩定的，且預期未來重分配政策的實施狀況也會持續的平穩。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取自：http://117.56.91.29/node/91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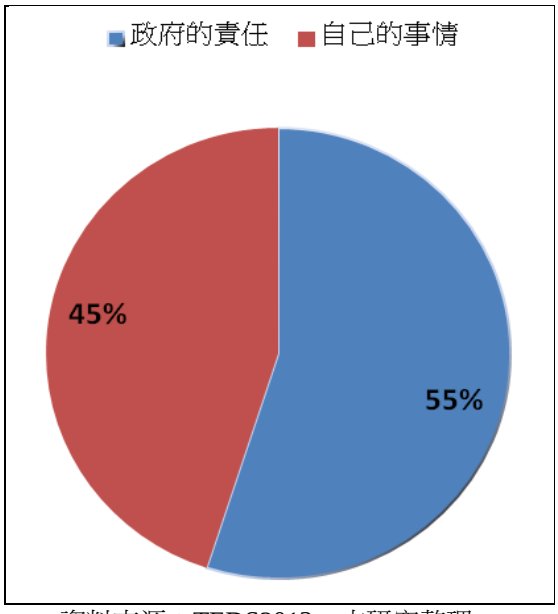
圖 3　我國歷年重分配政策佔政府總歲出百分比趨勢圖

肆、資料分析

一、敘述統計

(一) 依變數：重分配政策偏好

首先分析依變數「重分配政策偏好」的敘述統計，如圖4所示，認為貧富差距是政府責任者佔了55%，而認為是自己的事情者則佔了45%，分別有代表了1162與952位受訪者的意見，顯示大多數民眾傾向由政府解決目前的貧富差距問題。



資料來源：TEDS2013，本研究整理。

圖 4　政府是否該介入貧富差距之圓餅圖

(二) 自變數

表1顯示了各個自變項的描述性統計量，各變項的樣本數目不同乃因遺漏值數不同所致，以下分述個別變數的次數分配情形。

在人口統計變項的部份：男性與女性的比例各占是49%與51%；年齡以40到49歲的受訪者最多，而30歲以下的年輕人最少，只佔了整體的18%；教育程度以高中職28.7%所佔最多，其次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大學以上的28.2%，顯示多數的臺灣民眾最少都有受過高中以上的教育；職業以藍領勞工的747位最多，佔所有比例的36%，其次是高階白領的三成；家庭收入的部份首先可以發現拒絕回答者有413位，而有回答的部分比例最多的是25000以下的17.2%，其次是1300001以上的10.7%，剛好是最小值與最大值；在主觀社會地位的部分，大多數的受訪者是認為自己處在中層的地位（約占了48%），平均下來則是處在中下層到中層之間，只有極少（6%）的民眾認為自己是處在社會的上層階級；政黨認同部分，泛藍支持者、泛綠支持者與中立選民的比例約是3:3:4，大多數（36%）的民眾認為自己是中立的選民；最後，2292個受訪者中有三成的受訪者沒有宗教信仰。

表 1　人口統計變數之次數分配表

變數名稱	次數（百分比）
性別	2292(100)
男性	1134(49.5)
女性	1158(50.5)
年齡	2292(100)
20至29歲	413(18)
30至39歲	490(21.4)
40至49歲	465(20.3)
50至59歲	436(19)
60歲及以上	488(21.3)
教育程度	2286(100)
小學以下	383(16.7)
國、初中	310(13.8)
高、中職	657(28.7)
專科	291(12.7)
大學及以上	645(28.2)
主觀社會地位	2184(100)
上層	6(1)
中上層	123(5.2)
中層	1057(48.2)
中下層	669(31.2)
下層	330(14.4)
宗教	2292(100)
有宗教信仰	1598(69.7)
無宗教信仰	694(30.3)
職業	2089(100)
高、中白領	618(27)
中、低白領	563(24.6)
農林漁牧	161(7)
藍領	747(32.6)
其他[5]	203(8.9)
家庭月總收入	1879(100)
1300001 元以上	201(10.7)
100001 元~130000 元	153(8.2)
87001 元~100000 元	182(9.7)
75001 元~87000 元	145(7.7)
64001 元~75000 元	145(7.7)
55001 元~64000 元	177(9.4)
45001 元~55000 元	183(9.8)
36001 元~45000 元	189(10)
25001 元~36000 元	180(9.6)
25000 元以下	323(17.2)
政黨認同	2292(100)
泛藍認同	784(34.6)
泛綠認同	674(29.4)
中立選民	834(36)

[5] 職業「其他」包括家庭主婦、學生、一直無業、仍然在參與職業訓練的受訪者等。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然後在風險代理變數的部分如表2所示，有將近九成(88.2%)的受訪者表示自己或家庭擁有房子或公寓等不動產，乍看之下這與一般民間經驗似乎有所差異，但由於該題將範圍擴大至「家庭」以及「不動產」的範圍，因此仍尚屬合理；而民眾持有股票與債券等相對風險性之資產的比例偏低(38.4%)；最後，大多數(76%)的民眾家裡都有儲蓄。

表 2　風險變數之次數分配表

	是否擁有房子或不動產	是否持有股票或債券	是否擁有存款
有	2010(88.2)	862(38.4)	1700(76)
沒有	270(11.8)	1381(61.6)	536(24)
總和	2280(100)	2243(100)	2236(1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3　流動性認知之次數分配表

變數名稱	次數（百分比）
流動性預期	
臺灣未來一年會	2058(100)
會變不好	795(38.6)
差不多	1091(53)
會變好	173(8.4)
家裡未來一年會	2093(100)
會變不好	475(22.7)
差不多	1318(63)
會變好	300(14.3)
流動性經歷	
臺灣過去一年跟現在比	2236(100)
比較不好	1154(51.6)
差不多	916(41)
比較好	165(7.2)
家裡過去一年跟現在比	2259(100)
比較不好	756(33.5)
差不多	1353(59.9)
比較好	149(6.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3顯示了自變數流動性認知的次數分配。在「流動性預期」方面，包含了「臺灣未來一年經濟情形評估」以及「家裡未來一年經濟情形評估」兩個部分；

首先可以發現不論是對整個臺灣的經濟評估還是對自己家裡的經濟評估，認為未來會變比較好的樂觀者的比例均是偏低的，分別是8.4%以及14.3%，而且普遍來說認為臺灣未來的發展會較自己家裡來的不好，總體來說大多數人都是抱持著中間偏悲觀的態度；不過相較於整個臺灣的經濟情勢，大多數人對自己家裡未來的經濟評估是抱持較正向的預期。

在流動性經歷的部分，包含「對臺灣過去一年的經濟評估」以及「對自己家裡過去一年的經濟評估」兩個題目；而不論是對臺灣還是自己家裡的評估的樂觀程度都同樣是偏低的狀況，認為目前比過去好的比例分別只有7.2%與6.6%，甚至比流動性的預期還要低上許多，顯示多數民眾在過去並沒有較好的向上流動經歷；同樣的，民眾對臺灣過去一年的整體評估也較自己家裡的整體評價低，有51.6%的民眾認為臺灣現在比過去一年的經濟情況來的糟糕，反之有將近六成(59.9%)的民眾認為自己家裡和過去一年的經濟情形是差不多的；是以不論是流動性的經歷還是流動性的預期，民眾對臺灣的評估均較自己家裡的評估差。

二、迴歸模型

本研究欲了解民眾的流動性預期以及流動性經歷如何影響他們對政府重分配政策的偏好，依變項由於為二元變項，採取Logistic迴歸分析，建立之模型如下：

方程式：$\text{logit}(Y_1 i)=\alpha+\beta_1 X_{1i}+\beta_2 X_{2i}+\beta_3 X_{3i}+\beta_4 X_{4i}$

在Logistic迴歸模型中，Yi為第i位受訪民眾的重分配政策偏好，包含了民眾對政府是否該介入貧富差距問題；X_{1i}為第i位民眾對臺灣整體及對自己家裡未來一年的經濟情形的預期，X_{2i}為第i位民眾對臺灣整體以及對自己家裡目前經濟情形與過去一年經濟情形的評價，X_{3i}為第i位民眾自己或家庭持有股票債券、存款以及房子的情形，做為風險的代理變數，X_{4i}則為第i為民眾之個人人口統計變項，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主觀社會地位、家庭月收入、宗教信仰及政黨偏好。

表 4　預測是否支持政府介入貧富差距之勝算分析

變數名稱	Odd ratio
流動性預期	
臺灣未來一年經濟與目前相比	
比較好	.602**
差不多	.838
家裡未來一年經濟與目前相比	
比較好	.532**
差不多	.618**
流動性經歷	
臺灣過去一年經濟與目前相比	
比較好	.837*
差不多	.879**
家裡過去一年經濟與目前相比	
比較好	.784
差不多	.715**
擁有資產	.722**
持有股票債券	1.218*
女性	1.028
年齡	1.360***
教育程度	1.752***
主觀社會地位	.972
每月家庭總收入	.983
職業	
中低白領	.835
農林漁牧	.725
藍領	1.012
其他	1.168
無宗教信仰	.789*
政黨認同	
泛藍認同	.453**
中立選民	.683**
常數項	.610
Omnibusd 檢定	205.460***
Hosmer & Lemeshow 檢定	9.759
Cox & Snell R^2	.125
Nagelke R^2	.168

說明：

1. 流動性預期以及流動性經歷均以「比較不好」作為參照組
2. 職業以「高階白領」作為參照組
3. 政黨認同以「泛綠認同」作為參照組
4. ***表示p<0.00；**表示p<0.05；*表示P<0.1，採雙尾檢定。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如表4所示，在Logistic模型中，Omnibusd檢定值為205.460，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p=.000<.05)，表示模型具有統計上的解釋力；此外Hosmer & Lemeshow檢定值為9.759，並未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p=.278>.05)表示整體之配適度是良好的，是以可以繼續檢視該模型個別自變項對依變項的解釋力。

八個主要自變數中除了「預期臺灣未來一年差不多」以及「評估自己家裡現在比過去過得更好」兩個變數不顯著之外，其他的六個自變數均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勝算比[6]由高到低依序為：「預期自己家裡未來一年過得比較好」的負46.8%，代表那些預期自己家裡未來一年經濟會變更好的人在支持政府介入貧富差距之勝算上，會較那些認為未來經濟會更糟者低46.6%；「預期臺灣未來一年會變更好」的負39.2%，意味著那些預期臺灣未來一年經濟會變更好的人在支持政府介入貧富差距之勝算上，會較那些認為未來經濟會更糟者低39.2%；「預期家裡未來一年差不多」的負38.2%代表那些預期自己家裡未來一年經濟會與現在差不多的人在支持政府介入貧富差距之勝算上，會較那些認為未來經濟會更糟者低38.2%；「評估自己家裡與過去差不多」的負28.5%則代表那些認為自已家裡現在經濟與過去一年差不多的人在支持政府介入貧富差距的之勝算上，會較那些認為現在經濟比過去更糟者低28.5%；「評估臺灣現在比過去過得更好」的負16.3%表示那些認為臺灣現在經濟比過去一年更好的人在支持政府介入貧富差距之勝算上，會較那些認為現在經濟比過去更糟者低16.3%；以及「評估臺灣現在與過去差不多」的負12.1%，也就是那些認為臺灣現在經濟與過去一年差不多的人在支持政府介入貧富差距之勝算上，會較那些認為現在經濟比過去更糟者低12.1%。

至於在風險承受度變項上，同樣持有資產以及擁有股票兩個變數均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勝算比改變量前者為負，後者為正，分別為負27.8%以及正12.1%，代表民眾持有資產每增加一個單位，在選擇支持政府介入重分配政策時的勝算會減少27.8%；而相較於無持有股票債券的人，持有股票債券者在選擇支持政府的重分配政策上勝算會增加12.1%。

最後在人口統計變項上，共計有年齡、教育程度、無宗教信仰以及政黨偏好

[6] 勝算改變量(odds改變量)計算方式為odd ratio減1再乘上100%，用以解釋自變數每增加一個單位，或是該虛擬變數相較於參照組，會使勝算發生的變化情形 (Hair et al, 2006)，是以若odds ratio大於1，勝算改變量就會是正的，反之若odd ratio小於1，勝算改變量則會是負的。

中的泛藍認同與中立選民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其中年齡、教育程度的勝算改變量為正，分別為13.6%與67.5%，也就是說年齡越大、教育程度越高的民眾越支持政府應該介入貧富差距的問題。而無宗教信仰、泛藍認同與中立選民的勝算改變量則均為負數，分別為負21.1%、負57.7%以及負31.7%，也就是說認為自有宗教信仰且認同泛綠政黨的民眾越支持政府應該介入貧富差距的問題。

伍、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假設驗證

根據前一章實證分析之結果，結合研究假設綜合列於表5

表 5　研究假設驗證結果彙整

研究假設	研究假設檢定結果
H_1：與那些預期未來**臺灣**經濟會變不好的人相比，認為**臺灣**未來一年經濟情形會比現在更好的人，會較反對政府介入貧富差距的問題。	支持
H_2：與那些預期未來**家裡**經濟會變不好的人相比，認為**家裡**未來一年經濟情形會比現在更好的人，會較反對政府介入貧富差距的問題。	支持
H_3：與那些認為**臺灣**現在經濟比過去還差的人相比，認為**臺灣**現在經濟比過去一年還好者，較會反對政府介入貧富差距。	支持
H_4：與那些認為**家裡**現在經濟比過去還差的人相比，認為**家裡**現在經濟比過去一年還好者，較會反對政府介入貧富差距。	不支持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討論

本文利用TEDS2013面訪所蒐集到的資料為樣本來源，利用Logistic迴歸模型分析個人的流動性認知如何對重分配政策偏好產生影響；經過實證的研究後有下

列幾個重要的發現：

(一) 民眾普遍認為目前的經濟情形較過去壞，且對未來抱持悲觀的態度

只有分別7.4%與6.6%的民眾認為臺灣以及自己家裡現在經濟情形比半年前好，與此同時只有分別8.4%以及12.5%的民眾認為臺灣未來一年以及家裡未來一年的經濟情形會變得比較好，大部分的民眾對過去以及未來都是抱持著中間偏負面的看法；這部份顯示出大部分的臺灣民眾不但認為現在過得比以前還要差，覺得對未來也看不出好轉的跡象，而這邊也顯示了臺灣民眾的流動性認知與其他已開發國家一樣均是屬於偏向悲觀的(Alesina & Ferrara, 2005; Cojocaru, 2014; Rainer & Siedler, 2008; Revallion & Lokshin, 2000)，而悲觀的流動性認知─尤其是不好的流動性預期，對於整個社會來說是不利的，缺少了「隧道效應」的人們很容易一方面不滿意自己的處境，一方面又看不到未來好轉的跡象而開始感到憤怒與哀怨，容易由於階級差異而產生社會衝突。

(二) 流動性認知的確會影響民眾的重分配政策偏好

首先，POUM理論告訴我們民眾在選擇是否支持政府的重分配政策時，不只會關心目前的收入水平[7]，更會考量到未來收入的變動性；而本研究與證實了民眾的流動性認知的確會影響他們對重分配政策的偏好。實證的結果指出，目前的收入水準並沒有解釋力，而有較好的流動性預期以及流動性經歷會顯著性的反對政府介入解決貧富差距問題，這部分符合過去的研究結果(Alesina & La Ferrara, 2005; Alesina & Giuliano, 2009; Cojocaru, 2014; Rainer & Siedler, 2008; Revallion & Lokshin, 2000)，也印證了POUM理論的假說：人們在選擇是否支持目前重分配政策時，不但會考量目前的社經地位，更會將未來的收入水平納入考慮，如果人們預期將來自己會有向上的流動性預期的話，並考量了政策的持續性後，為了避免將來自己或自己的下一代成為重分配政策的政策受害者，會反對政府施行重分配政策 (Benabou & Ok, 2001; Piketty, 1995)；而在流動性經歷的部分，相較於有不

[7] 參照其餘亞洲國家經驗，現在的收入水平再考量了對未來的預期後，對於重分配政策的偏好同樣是沒有影響力的，也指出了對未來預期的重要性，參照Lee(2016)。

好的流動性經歷者，有較好的流動性經歷者會使他們預期將來也會同樣有好的發展(Revallion & Lokshin, 2000)，同時可以藉由努力來改變目前的社經地位(Alesina & La Ferrara, 2005)，是以會反對政府介入貧富差距。

此外，本研究發現人們對「自己家裡」以及「整個臺灣」的經濟情形的預期與評價都有達到統計上的解釋力，是以本文認定不論是「個體」（自己家裡）還是「總體」（整個臺灣）層級的流動性認知，都會對個體的重分配政策偏好產生影響，如同過去相關研究重分配政策的研究結果(Alesina & Ferrara, 2005; Cojocaru, 2014; Rainer & Siedler, 2008)，人們的政策偏好會同時受到個體以及總體的層級所形塑。

不過，當我們個別分析流動性預期以及流動性經歷對民眾重分配政策偏好產生的影響時，我們發現到相較於流動性經歷，民眾的流動性預期在本研究的模型中展現出較好的一致性以及邏輯性，分別展現在下列兩點：

首先，即便人們的政策價值同時受個體以及總體層級所影響，本研究發現到民眾「個體」層級的流動性預期較「總體」層級的流動性預期更具有影響力，也就是說當我們分析「個體」層級的重分配政策偏好時，同樣好的流動性預期，民眾對「自己家裡」的經濟情形的感受程度會高於「整個臺灣」的經濟情形：在兩組模型中可以發現到，民眾在對自己「家裡」的預期的影響，不論是覺得「比較好」或是「差不多」，都大於對整個「臺灣」的預期的影響：也就是說，同樣是對未來感到樂觀的人，對「自己家裡」樂觀程度較高者，會比對「整個臺灣」感到樂觀者，從理性自利的觀點，更反對政府的重分配政策。這個發現也與 Rehm (2005)強調，即便個體的重分配政策偏好是同時受到個體以及總體的層次所影響，但分析重分配政策時「個體」層級的重要性會大於總體所相呼應。從臺灣社會現象來解釋，臺灣經濟成長下所產生的利益往往僅被某些特定的財團或團體所把持，比方說陸客來台所帶來的經濟效益幾乎都「一條龍」得被少數的旅遊業集團以及特約商店所壟斷，或是政府獎勵特定產業所端出的政策也只讓標的團體受惠，一般民眾即便看得到臺灣經濟成長的數字，但享受不到實質的利益，是以反對重分配政策的幅度自然不如自己家裡的成長來的具體與強烈；反之自己家裡的經濟情形將樂觀程度會直接影響到未來收入，也就是家庭有著向上流動性預期會讓他們有更高的機率「跨層級」到高於平均社會，是以在政策價值偏好上會較反

對重分配政策的。

此外，即便都是好的流動性預期，「樂觀程度」的高低會影響到民眾對重分配政策價值之偏好：也就是說同樣不預期未來比較差，有好的流動預期者會較持平流動性預期者更反對政府的重分配政策，在模型中，回答預期未來會未來「比較好」的影響力都大於回答預期未來會「差不多」者，也就是說對未來感到樂觀的人，相較於對那些對未來態度持平者，更反對政府的重分配政策；從理論層面解釋，POUM理論的關鍵假定的一項：如果個體收入目前比整個社會的平均收入低，並預期自己將來的收入會高於社會的平均水準時，預期未來會變好者會反對政府的重分配政策(Benabou & Ok, 2001)，即指出了這種預期「跨層級」到高於社會平均水平心理的重要性：由於低於社會平均則表示較可能是重分配政策的政策受益者，而高於社會平均則會是政策犧牲者，基於理性自利的心態，只要在高於社會平均的重分配政策犧牲者會反對政府的重分配政策(Cojocaru, 2014)。

相較於流動性預期，同屬流動性認知的流動性經歷在模型中呈現的結果較缺乏一致性：在模型中，個體評估「自己家裡比過去還要好」沒有解釋能力，而「認為目前比過去還要好」的影響力小於「認為目前跟過去差不多」，從邏輯來看並不符合常理；從理論的層次來看，相較於針對流動性預期與重分配政策偏好關係之POUM理論，文獻上針對流動性經歷與重分配政策之間之關係尚未發展出一套系統化的理論，導致只能根據同屬流動性預期的POUM理論的邏輯以及人們心理誘因去推論流動性經歷如何影響個體的重分配政策，那為什麼流動性預期的理性自理誘因以及風險趨避心理的邏輯無法一概推論至流動性經歷呢？Piketty (1995)指出人們過去的個人經歷是一種自我學習的機制，在人們成長階段發生的經歷會對他們成人後的觀念造成影響，會藉由調整個體對「公平的認知」途徑進而影響個體對重分配政策的偏好，或許就是因為模型中缺少了「公平的認知」才導致在分析流動性經歷與重分配政策偏好時產生這類難以解釋的現象；過去臺灣相關的文獻有發現，民眾的「公民意識」越高（陳文學、羅清俊，2012），或越認為個人無法藉由努力來改變貧富差距的現象時（何智翔、林翠芳，2011）會加重對政府重分配政策的偏好，未來相關研究若能納入類似的公平認知變項來分析流動性經歷與重分配政策的關係會更加周延。

自2007年起，伴隨雷曼兄弟倒閉所衍生的金融風暴與歐債危機所造成的全球

性經濟大衰退，失業率與通貨緊縮雙重打擊下擴大各國所得分配差距，顯然各國政府擬以重分配政策來控制所得分配惡化，卻又受限於經濟衰退下所引發的政府財政危機，以致成效不如預期。

那什麼樣的因素能夠舒緩民眾對貧富差距不滿的心理呢？在本研究中討論了「流動性」的重要性。具體而言，如同「隧道效應」所言，即便目前人們是處在經濟較不佳的地位，只要預期到未來會有所改善，則這種對未來樂觀的心理會舒緩民眾目前因不平等所導致的各種不滿意感與憤怒(Ravallion & Lokshin, 2000)；然而，當整個社會的階級流動趨緩，有錢人的下一輩持續享受著上一代打拼的果實，而窮人階級也無法透過努力或教育來向上流動到較佳的社會地位，這種「階級複製」的現象逐漸成為全世界的問題時，社會上的機會與資源被既得利益者所把持，民眾的心裡自然對未來呈現悲觀的態度：英國廣播公司(BBC)花了49年的時間追蹤社會上十四個來自不同家庭的人，從他們七歲到五十六歲，希望了解不同階級的人是否能藉由不同的努力與發展而改變自己先天的劣勢，在這部叫做《56UP》的紀錄片中，觀眾們所看到的是越來越趨緩甚至停滯的社會流動性：出生在富有家庭者大多仍然過著順遂的人生，不必擔心自己的生計，有著較好的教育並去貴族學校就讀，並在成年後有著較好職業─正如同他們的父母一樣；與此同時，窮人的孩子仍然過著並不是很好的日子，做著社會底層被取代性高的職業，並為了家計而煩惱；這樣社會階級僵化與複製的情形成為一種常態，人們的生活幾乎取決於自己的出生家庭而非自己努力程度時，人民對未來的樂觀程度自然普遍偏低，無法預期將來自己會過得比較好的悲觀心理對於整個社會發展會產生負面的影響。

而在臺灣，隨著經濟發展後所帶來貧富不均、產業外移以及失業率等問題日趨嚴重，社會公平以及資源重分配議題成為越來越熱門的話題，民眾對於政府無力解決社會不平等的問題感到憤怒，政府應該實行怎麼樣程度的重分配政策才能夠改善社會的所得不均成為關鍵的問題；從POUM的理論中，我們知道只要民眾能夠對未來有好的預期，則對目前地位的不滿感會藉由隧道效應而改變，也因此，如何能讓民眾真正對未來感到樂觀並使他們相信自己未來的生活能夠獲得改善，就是政府的一個重要施政目標，以下從流動性之觀點提供相關政策建議：

(一) 教育面之強調

Alesina(2005)指出教育程度不但能直接影響重分配政策外，有較高教育程度者由於在社會上有較好的競爭優勢，也因此會同時有較好得流動性預期。然而過去政府規劃之多元入學方案，就某些方面來說卻是增加了階級複製的容易性，因為富有階級的學生可以有更多的時間與資源去參加課外的活動與表現，背景和資格上更加具有優勢，而窮人階級的學生仍然缺少相關的資源來與前者競爭；因此在相關教育政策上，應該在公平的前提下，思考出讓民眾均能獲得良好的教育水平，以增加樂觀的流動性預期。

(二) 產業結構之調整

過去政府希望讓人民「有感」而實施的眾多政策，諸如央行為了增加出口而藉由操作市場的方式讓新台幣貶值，或是鬆綁房市管制來刺激房地產，甚至是過去相當熱門的中國團客一條龍的旅遊業經營等方式，即便有可能讓整體經濟數字成長，但對一般民眾的生活改善並沒有太大的幫助，實際上是犯了公共政策所稱之「第三類型錯誤」，因為對一般民眾來說享受不到政策實際的效果，就本研究也發現到「個體」層級的流動性預期才是關鍵，那麼若政府的政策沒有辦法讓一般民眾預期到將來會有好的發展，那對現狀的不滿感自然不會因此而減少；也因此，政府在相關的施政上，應該以一般民眾能確實有感的政策為優先。

本研究從社會階級流動的角度觀點來看政府的政策，重分配政策是政府用來減緩社會貧富差距的主要工具，例如近年來政府提出的奢侈稅及房地合一稅等，都在某種程度上產生所得重分配的效果，對於社會階級流動產生影響。然而，政府除了應持續解決因所得不均而導致的貧富差距外，本研究透過POUM理論所分析的結果得知，如果要讓一般民眾有樂觀的流動性預期，更重要的其實是要讓人民「看得到未來」，也就是相信自己以及自己的下一代能夠有更好的發展，使民眾因貧富不均所產生之不安定感能藉由「隧道效應」的出現而獲得舒緩。是以，政府應該思考如何藉由各種手段來促進社會階級的流動，避免階級僵化與流動停滯，方使人們對未來能夠有樂觀的預期。

參考文獻

何智翔、林翠芬（2011）。我國人民對政府重分配政策偏好之探討。**當代財政**，3，61-74。

徐偉初、歐俊男、謝文勝（2012）。**財政學**（3）。台北：華泰。

陳文學、羅清俊（2012）。影響臺灣民眾重分配政策偏好的因素。**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4(3)，367-397。

羅清俊（1988）。分配政策研究的發展與應用。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0(4)，575-609。

Alesina, A. & Ferrara, E. L. (2005). Preferences for Redistribution in the Land of Opportunities.***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9**(5), 897-931.

Alesina, A. & Giuliano, P. (2009). Preference for Redistribution.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4825**, 1-38.

Anderson, J. E. & Shimul, S. N. (2016). Preferences for Redistribution in Transition Countries.***Association for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 at the Allied Social Sciences Association meetings***, Chicago, USA.

Andreoni, J. (1990). Impure Altruism and Donations to Public Goods: A Theory of Warm-Glow Giving.***The Economic Journal,* 100**(401), 464-477.

Benabou, R. & OK, E. A. (2001). Social Mobility and the Demand for Redistribution: The POUM Hypothesi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16**(2), 447-489.

Checchi, D. & Filippin, A. (2003). An Experimental Study of the POUM Hypothesis. ***Res. Econ,* 121**, 115-136

Cojocaru, A. (2014). Prospects of Upward Mobility and Preferences for Redistribution: Evidence from The Life in Transition Survey.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34**, 300-314.

Easton, D. (1965). ***A System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 New York:Wiley.

Hair, J. F. & Black, W. C. & Babin, B. J. & Anderson, R. E. & Tatham, R. L. (2006). ***Multivariate Aata Analysis***(6nd *ed*). London: Pearson.

Isaksson, A. S. & Lindskog, A. (2009). Preferences for Redistribution—A Country Comparison of Fairness Judgement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72**(3), 884-902.

Lasswell, H. D. (1936). ***Politics: Who Gets What, When, How***. New York:Whittlesey House.

Lee, S. (2016). ***Testing the prospect of upward mobility hypothesis in South Korea. The Social Science Journal,*** **53**(4), 545-554.

Lowi, T. (1972). Four Systems of Policy, Politics, and Choic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33**, 298-310.

Meier, K. J. (2007). ***Politics and the bureaucracy: Policymaking in the Fourth Branch of Government (4th ed.)***. TX: Harcourt College Publishers.

Piketty, T. (1995). Social Mobility and Redistributive Politic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0**(3), 551-584.

Rainer, H. & Siedler, T. (2008). Subjective Income and Employment Expectations and Preferences for Redistribution. ***Economics Letters,*** **99**(3), 449-453.

Ravallion, M. & Lokshin,M. (2000). Who Wants To Redistribute? The Tunnel Effect in 1990s Russia.***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76(**1), 87-104.

Rawls, J. (1971).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ehm, P. (2005). Citizen Support for the Welfare State: Determinants of Preferences For Income Redistribution. ***WZB Markets and Political Economy Working Paper,*** **2**, 2-39.

Weimer, D. L. & A. R. Vining. (1992). ***Policy Analysis: Concepts and Practice(5th h).*** Pearson: Prentice Hall.

The Impacts of Voters' Social Mobility Consciousness on Redistributive Value Preferences: A Study on the TEDS 2013 Data

Hsiang-Kai Dong*, Jian-Yo Guo**

Abstract

Benabou and Ok introduced the Prospects of Upward Mobility (POUM) theory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s pro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and their preferences with regard to redistributive policies. Benabou and Ok found that people who have average socio-economic status are less likely to support redistributive policies if they believe that their socio-economic status will rise in the future. Similarly, people's preference for redistributive policies are influenced by their past experience. Using data from 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2013, we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mobility consciousness, or people's beliefs about their social mobility, and preference for redistributive policies. The findings of this research include three major indications. First, people who have an optimistic perception of their own upward mobility are more likely to oppose redistributive policies. Second, people are more influenced by the prospect of upward mobility on an individual, rather than national, level. Third, people's beliefs about their chances of upward mobility have greater impact and are more consistent and logical than people's actual

*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ep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ssistant Professor
E-mail:hkdong@nccu.edu.tw
**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ep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Master's Student.

experience of socio-economic mobility. Policy and managerial implications for the government are discussed.

Keywords: POUM Theory, Prospect of Mobility, Experience of Mobility, Redistributive Policy, Social Mobility